

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

王平 /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

王平 著

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经八纬一路 321 号

出版日期：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001—3000

用纸规格：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15.375 印张 336 千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书 号：ISBN 7-5328-2294-X/I·50

定 价：16.00 元

序

邓绍基

王平同志是我的老友袁世硕教授的受业弟子。90年代以来，我在《文史哲》、《山东社会科学》和《东岳论丛》等刊物上陆续读过他的论文，大都是论说中国传统小说，从汉魏六朝作品到近代作品，都有涉及。给我的印象是他在研究中国小说史，又是偏重于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去作观察和审视，正如他自己所说：“古典小说的各个环节上都不能不深深地刻上文化心理的烙印。”因此，他决定“从文化心理角度去透视小说史”。正因为着重从文化心理去审视小说创作现象，他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指出有的学人把话本与拟话本差异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创作者自身条件的偏颇，指出有的研究者把《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严重缺陷产生原因主要归结为创作者“落后的世界观及其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而且有的研究者所说的“主要”又成了“唯一”的同义语，那就更为偏颇了。现在学界对“文化心理”这一词语的解释时有歧异，王平同志采用了通常的一种理解，即指文化的各个层面在人们心理上所形成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形态、价值取向等等。相对于作家主体而言，所谓文化心理实是社会文化心理。如果不把社会原因狭隘地理解为政治、经济原因（像过去一个时期内流行的那样），

那么，探索社会文化心理，实也是探索文学创作的某种社会原因。和80年代以前的论文相比，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化。王平同志的写作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他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当然，王平同志又是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的，他的《从二郎神形象略窥〈西游记〉创作心态》就是从吴承恩对历来二郎神传说的选择和加工，发现了作家创作心态的某个方面，从而也对《西游记》中为什么既写二郎神擒拿孙悟空，又写孙悟空后来与二郎神称兄道弟，共翦妖魔这一“矛盾”现象作了独到的解释，这是一篇读来很有兴味的文章。

王平同志还有些论文也使我很感兴趣，如《〈型世言〉与明代商品货币经济》一文中论说商人形象和经商活动的描写，使我有种同道知音之感。我在50年代曾写过一篇题为《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的文章，还写过一篇《“三言”“二拍”与市民文学》的短文，我认为“三言”和“二拍”反映市民生活的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商人、手工业者大量地作为作品里的正面主人公出现。我还说到：在一些描写市民生活的小说中，对商人“本业”的公开赞扬，商人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感已堂而皇之地被提出来。我说：“当我们读到这些描写的时候，它使我们想起在某些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把科举仕途视作是世业的人们的口吻，那种以世代无白衣卿相为骄傲的自豪感，这两者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对比。”

《型世言》是前些年在韩国发现的，早先我们只知道有《幻影》，一名《型世奇观》，又称《三刻拍案惊奇》，现在才知道它来自《型世言》。所以这部《型世言》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虽然现在学人对它的艺术成就是否能与“三言”、“二拍”特别是

与“三言”等量齐观尚有不同看法，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若干与“三言”、“二拍”的思想特色的共通处是毫无疑问的。王平同志论文中举出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七回和第三十八回中关于商人形象和经商事业的正面描写，论说“不仅商人们热衷于经商获利，那些世代书香门第之家，积祖务农之家以及老实忠厚的仆人，望子成龙的父母，也都看好了经商之途，或者亲自经营，或者勉励子弟。做买卖、搞生意成为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业，一种兴家立业的最佳方式”。这确实是把握住了这部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这也正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新颖的人格和新颖的价值取向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这种社会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如果就这种特点或类似这样的特点而言，“三言二拍一型”并列的说法确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们在内容上确有不少共同性。

我正是在读了王平同志的若干论文后才同他相识的。那是今年五月，承袁世硕教授相邀，我伴同陈毓黑兄到济南参加世硕教授指导的两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王平同志随他的老师到车站来接我们。在济南停留的两天中，蒙他多方关照，还陪我们去了千佛山，其间多有交谈。他说起他在已有的一些论文的基础上，撰写成一本专著，书名为《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我很感欣慰，因为这表明他在研究古代小说的进程中又取得了新的成绩。我一直认为，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涌现出来一批新的研究工作者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他们的知识结构具有新的特点，又承继了固有的治学传统，成果迭出，前途无量。虽然80年代兴起的“新方法热”中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浮躁不实的倾向，但大多数中青年学者还是成绩卓著，从而形成一种空前的新气象和新格局。正是怀着这种心情，

当王平同志嘱我写序时，我一口承应。

回京后，陆续读了他寄来的稿子，方知我以前读到的大致是属于这本著作的“分论”的内容，另有“总论”部分，分作四章，分别论说古代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文化转型与古代小说的嬗变、文化诸范畴对古代小说的影响和古代小说理论的文化特征。这四章汇总起来，实际上又是从宏观上论述和探讨古代小说与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层次分明，内容丰富，既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更有独自の创获。在我看来，这部著作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史研究论著，但实际上有小说史著作的性质。当然，它并非只是仅仅换一种视角来审视评说古代小说史，而是在改变视角的同时多有新见创获。因此实又是小说史研究的新收获。

我对古代小说缺乏系统研究，并不是为这部著作写序的合适人选。但俗话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据说这句话是从《论语》中的“驷不及舌”演变出来的。《论语》中是说“君子”说话要慎重。我大概并不符合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条件，但我却也不能失信于比我年轻的王平同志。于是匆匆写出如上感想，权为序文。不当之处，伏望批评、指正。

1995年11月下旬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学的方法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10
第三节 古代小说与文化的关系	19

上编 总论

第一章 古代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	31
第一节 原始宗教对民族心理的熔铸	31
——远古神话的文化心理特征	
第二节 徘徊于信仰与艺术之间	39
——汉魏六朝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	
第三节 理性精神与宗教观念的消长	46
——唐代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	
第四节 儒释道互补与新旧文化的冲突	54
——明清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	
第五节 区域文化的个性与融合	64
——古代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	
第二章 文化转型与古代小说的嬗变	81
第一节 宗教文化、史官文化与神话历史化	81

第二节	佛道玄学与志怪志人小说	88
第三节	中唐文化的转变与唐传奇	97
第四节	明末异端思潮与明清之际的小说	103
第三章	文化诸范畴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111
第一节	儒学价值观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111
第二节	佛道文化影响古代小说的四种方式	124
第三节	传统思维模式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143
第四节	民俗文化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155
第五节	社会经济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168
第六节	社会政治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176
第四章	古代小说理论的文化特征	188
第一节	古代小说理论的史学文化特征	188
第二节	古代小说理论重道的文化特征	201
第三节	古代小说性格理论的文化特征	217
第四节	古代小说理论形态的文化特征	226

下编 分论

第五章	唐宋元小说的文化考察	237
第一节	唐传奇与士子文化心态	237
第二节	宋元话本与市民文化	253
第六章	明代小说文化分析例证(上)	269
第一节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人文特征	269
第二节	宋江:双重社会教化的悲剧角色	283
第三节	二郎神形象与《西游记》的创作	297
第四节	《四游记》与民间信仰	310
第七章	明代小说文化分析例证(下)	322

第一节 《金瓶梅》:文化裂变孕育的畸形儿	322
第二节 “二拍”情爱作品的文化内涵	338
第三节 《型世言》与明代商品货币经济	352
第八章 清代小说文化分析例证(上)	366
第一节 《醒世姻缘传》与民俗文化	366
第二节 《聊斋志异》“幻化”的文化特征	385
第三节 《聊斋志异》与道教文化	397
第四节 《聊斋志异》与俗文化心理	410
第九章 清代小说文化分析例证(下)	422
第一节 《儒林外史》:文化反思与整合的艺术显示	422
第二节 《红楼梦》《金瓶梅》色空观念之比较	437
第三节 《红楼梦》与佛道文化	451
第四节 《老残游记》的文化内涵及其渊源与价值	463
后 记	478

绪 论

从文化角度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庞大而新颖的课题，它对于揭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民族内容和民族形式及其内在原因，对于掌握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然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那么，就应当对文化的有关问题、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对古代小说与文化的关系，作一些必要的说明。上述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重点更加明确，研究范围更为集中，研究方法更为科学。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学的方法

—

文化作为科学术语，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概念。在1920年以前它仅有6种不同的含义，但是到了1952年，它却激增到164种之多。在这众多的文化概念中，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定义受到普遍的重视，他说：“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这一文化定义虽然包含的内容已极为广泛，但有人认为它仍不全面。于是后来美国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对这一定义进行修正，补充进了“实物”的内容。

我国学者在文化研究论著中也提出了种种文化概念，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梁漱溟 1920 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这一“样法”包括人类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三大内容，可见这种文化的涵义极其广泛。1987 年，我国文化社会学家司马云杰出版了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文化社会学的专著《文化社会学》。在这部书中，司马云杰给文化确定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①这一定义首先强调了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其次，所谓的“特质”是指人类创造物的最小独立单位和人类创造物的新的内容和独特形式；再次，它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包含着各种特质相互关联的全部总和；最后，它所说的“不同形态”既包括物质形态，也包括精神形态，以及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形态。这一定义从文化本身的规定性作出，又注意了文化现象与人类活动的一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和形式的区别，因此，它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依据这种广义的文化定义，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精神文化三大类型。物质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它包括工具、房屋、器皿、机械等文化范畴。规范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它包括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和法律形式、风俗习惯、伦

^①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 页。

理道德、语言、教育等文化范畴。精神文化是人类自我完善的方式，它包括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文化范畴。应当说明的是，科学知识、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作为观念形态存在时，也可以划归为精神文化这一类型。各类型文化之间以及各文化范畴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人们心理上就会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形态、价值取向等等。这套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构成了文化的核心。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文化的创造，正如恩格斯所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 人类在进行文化创造的同时，也就发展了自身生产劳动的能力；随着生产劳动能力的提高，也就不断改变其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就构成了人类“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② 物质文化的发明创造直接发展出了阶级、集团、权力、地位等社会结构，为社会的存在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和法律形式等既是规范文化，又是社会参数。作为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诸范畴则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可见文化与社会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物质文化的发明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自身的积累，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三卷第 154 页。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一卷第 363 页。

这便是文化独立性的表现。规范文化中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语言等并不是随着社会变革而立即发生变化，总是表现出不同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至于精神文化中的各范畴，其独立性就更为明显，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可以说具有超稳定的独立性。上文所说的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结构、模式、形态、价值取向等就是文化稳定性、独立性的表现。文化的这种稳定性、独立性提醒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时，不仅有社会的视角，而且有文化的视角，二者既有联系，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人类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类型是指各种文化形态体系最有特色、最能显示一种文化本质属性的特征，而不是指它的全部特征的总和。这一点则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精神及价值体系方面”。^①每一种文化精神都显示了它别具一格的特色，并且使一种文化共同体区别于另一种文化共同体，从而构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民族由于文化个性的不同，又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文化的构成方式及其稳定特征决定着文化模式的情形。最为明显的是从区域上划分出的种种文化模式，如西方文化模式和东方文化模式，东方文化模式又有印度文化模式、日本文化模式、中国文化模式等等。与文化类型一样，文化模式最根本的特征仍在于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方面。

文化虽有着较明显的稳定性，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相似，文化的发展总是通过认同和离异两种作用进行。“认同”即与已有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对已成模式进一步开掘；同时还要对异己力量进

^①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行排斥和压抑，以使主流文化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即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采取否定和怀疑的态度，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使被排斥的异己力量得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所谓文化转型时期就是指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时文化发展明显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速的重组与更新。与认同时期相比，离异时期或曰转型时期的文化对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巨大深刻。

二

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且是一种依赖于个人的极富个性的精神活动，作家和诗人似乎在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个个文学形象，一首首动人的诗篇。但是当我们搞清了文化与个人的关系时，也就会对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认识。

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类就不会有文化。但是对于某一个人来说，文化又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每个个人都降生在先于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之中，这一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支配着他，并随着他的成长，赋予他以语言、习俗、信仰。他的心理和行为是文化环境的产物，是文化熏陶、感染、教化的结果。正是文化，向他提供了他之所以为人的那种行为的形式和内容。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曾指出：“个人是文化所造就的产物，个人只是外形，文化才是内容。”^① 为什么一个民族喜欢喝牛奶，而另一个民族却厌恶牛奶，这并不取决于

^① 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人自身，而取决于他们的文化。

在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中，文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意识的许多属性并非由先天的人性造成的，而是由外部文化刺激所引起的。例如，嫉妒情敌被认为是一个情人的“真正本性”，如果一个人杀掉了引诱他妻子的人，便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即使判他无罪，人们也不感到奇怪。但是在爱斯基摩人中，把妻子借出去招待客人是好客的表现；萨摩亚人也完全不懂得情人之间的嫉妒心理，而且认为人们在这方面的情感是十分荒唐的。再如恋母情结，人们以往认为，一个男孩憎恶他的父亲而热爱他的母亲，仅仅是他生物本性的表现。但实际上，这些态度是随着家庭结构类型不同而变化的。在有些社会里，家长是母亲的兄弟而不是丈夫，父亲成了仁慈宽容的朋友与伙伴。在这样的家庭中，恋母情结便不可能存在。

文化还是无意识行为的决定因素，例如许多禁忌，个人既不知道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目的。还有许多礼仪规则，个人对其来源与目的也几乎一无所知。但是这些禁忌和礼仪都是文化传统使然，都有着一定的目的和意义。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离不开思维、感觉等心理过程，但作家在思维什么？为什么他要如此这般地进行思维？这又是文化所决定的。当然，作家并非总是以纯粹被动的方式受着文化的制约，他也反作用于文化。但是，作家的能动作用总要与文化发生种种关联。例如，我们说曹雪芹以其宏篇巨制《红楼梦》向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发起了挑战，但是他借助的重要思想资料却是佛道文化。再如吴敬梓以其煌煌巨著《儒林外史》向封建政治型文化和道德型文化的分裂提出了批判，但是他的最终理想是希望两者重新实现统一。文学创作中也存在着

无意识的情形，例如《聊斋志异》中大量的怪异记载，实际上是文化传统中以怪异影射现实的功能的表现。

不错，每一位成功的文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但是这一创作个性不应当仅仅归结到他的生理因素上，而应当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寻找原因。这正是我们从文化角度研究古代小说的原因之一。

三

本书试图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那么，文化学究竟有哪些方法呢？其中何种方法更适合于我们的研究呢？

我国著名的文化学家黄文山先生曾将文化学的方法概括为历史叙述方法、心理统形方法、因果功能方法、理则的评价方法、科学的比较方法等五种。^① 黄文山认为：“民族志家、人类学家与文化史家采用历史叙述方法，来研究文化的纯粹空间性的和机械性的堆积，所以事实上，只能对于宗教、道德、家族、经济、地理、魔术、政治、艺术以及其他文化价值，提供一个流水帐簿及目录般的叙述。”“如果采取纯粹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来解释文化，在考核上，我们只能这样追问：它对于一切的文化元素或特质有没有提供一个详备的目录？关于文化的量和质，有没有正确的叙述？文化的空间和时间的相对的地位，有没有经过一番的观察？假使这些目的都一一达到，则其所获得的结果，就是文化学研究的一个理想的发端。”因此，历史叙述

^① 参见黄文山《文化学的方法》，载《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方法可视为文化学研究的最基本、最初的方法，它可以为我们理清文化的大体情形、发展脉络，提供尽可能详备的文化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而把握文化的特征、本质等深层的内容。

文化包含内部与外部两种状态，内部状态也就是文化心态，包括价值、观念、意义、思想等；外部状态由各种现象如物体、事件、过程等构成。显而易见，内部状态比外部状态更为重要，因为内部状态可以决定外部的现象，并且使外部现象在某种意义与某种范围内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但是，要把握内部状态所包含的价值与意义，又必须从外部的媒介入手不可。外部媒介与内部价值并非总是表里如一，这就需要运用心理观察的方法，使我们的观察与作者的心态尽量求得一致。一切文化物象，都提供了充分的材料，供我们从外部状态追究探索其内部状态的真实含义。因此，探讨古代小说与文化心态的关系，可以运用心理观察的方法。文化心态的研究方法有许多类别，而以统形方法最值得注意。统形的概念即整体的概念，指能够驾驭某种文化中的个人及团体行为的那种文化精神。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一种文化，就必须深深探索并牢牢把握这一文化的精神。研究古代小说与文化的关系，也首先应当认清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

因果功能方法包含因果方法与功能方法两个方面。因果方法即研究文化各个部分因果关系的方法，功能方法即将文化各个部分还原到价值、意义的方法。黄文山认为：“文化整体的各部分之关系，如果有因果的或功能函数的联合，则采用因果的功能的方法，为之研究，这当然是综合的研究最正当的程序。例如有某类文化现象甲，乙，丙，丁……于此，其中甲与丙是功